

《贤者喜宴——吐蕃史》的内容及其史料价值

周润年 黄 颢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著名的藏文典籍《贤者喜宴——吐蕃史》不仅叙述了吐蕃赞普的业绩,还大量地记载了吐蕃政治、军事、法律、文化、行政建制等方面的丰富史料,全面地反映了吐蕃的社会和历史。该书取材丰富广泛,而且吸收了大量原始资料,例如吐蕃赞普诏告、会盟誓词、吐蕃小邦、氏族分布、五茹六十一东岱名录等等均为罕见史料,有重要史学价值,为后世学者所推崇。本文主要论述了此书的内容、特点及史料价值。

关键词 贤者喜宴 吐蕃史 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8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88(2010)01-0001-10

一、作者简介

巴卧·祖拉陈瓦(dpav-bo-gtsug-lag-vphreng-ba)(1504—1566)出生于西藏拉萨聂塘(snye-thang)地方,为“尼牙”(gnyags)族。父名喇嘛达尔,母名拉尼卓玛,在他们三子中排行老二。5岁时,被认定为巴卧一世曲旺伦珠的转世,迎到洛扎卓卧寺坐床、出家,后拜喇嘛多丹格顿嘉措为师,学习藏文。9岁时,从四世噶玛巴红帽派曲吉扎巴受沙弥戒,起法名为米帕却吉嘉措。12岁时,前往达布地方拜大学者却杰丹贝坚赞为师,修习新旧密法,后又从贡嘎桑波大师修习大手印教法。20岁时,在夏鲁大译师却郡桑波座前受比丘戒。29岁时,前往工布与第八

世黑帽派大宝法王噶玛巴弥觉多吉相会,得名“大德祖拉陈瓦”。后一直驻锡洛扎拉隆寺,主持寺院政教事务。^{[1](P37)}先后拜法王丹贝坚赞、曲吉扎巴、那如噶贡嘎桑波、夏鲁大译师却郡桑波、弥觉多吉等人为师,通达显密佛学及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成为一位杰出的藏族学者。有多种著作面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入菩萨行论广释》、《历算典籍》、《金刚亥母广论》、《四部医典释》、《药学笔录——摄集精华》、《历算大宝库世藏》、《贤者喜宴》等著作。^{[2](P1277-1278)}

《贤者喜宴》一书全称为《dam-pavi-chos-kyi-vkhor-lo-bsgyur-ba-rnams-ki-byung-ba-gsal-bar-byed-pa-mkhas-pavi-dgav-ston-zhes-bya-ba》。一般简称为《mkhas-pvi-dgav-ston》,又称《洛扎佛教

[收稿日期] 2009-11-06

[作者简介]周润年,1954年6月生,河北康保人。197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藏语言文学专业,后又在本院古藏文进修班、研究生进修班学习。现任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台湾政治大学、世界新闻大学和法光研究所以及西藏大学的客座教授。

撰写和参与编撰有《拉萨社会发展研究》、《藏族民俗》、《藏族宗教与文化》、《藏族教育》等专著10多部,翻译藏文典籍《红史》、《萨迦世系史》和《西藏古代法典》等5部;主编、撰写有《藏族大辞典》等辞典8部,撰写有《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论》等论文80余篇。专著《中国藏族寺院教育》获北京市2000年社会科学一等奖,《西藏教育五十年》获得2003年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参与编写的《中国西藏地方藏文历史资料选编》一书,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和国家教委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藏族大辞典》和论文《西藏古代“十六法典”的内容及其特点》获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优秀成果三等奖。曾多次到美国、韩国以及台湾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黄颢(1933-2004),男,北京人。1959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班,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从事藏族历史研究工作,研究员,曾任藏族史研究组组长。专著有《在北京的藏族文物》,合著有《西藏五十年——历史卷》、《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活佛转世》、《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等。译著有《新红史》、《青海史》、《嘉木样谢贝多吉年表》、《德乌佛教史》、《藏文史料译文集》等。

史》(lho- brag- chos- vbyung)。全书共分五大章(skabs- chen- po- lnga)即世界形成之章、天竺之章；吐蕃史之章、于阗、汉地、西夏(木雅)、蒙古、汉地晚近之章；大小五明之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ja函《吐蕃史》，藏文为bod- kyi- rgyal- rabs，其全称是《chos- byung- mkhas- pavi- dgav- ston- gyi- yan- lag- gsum- pa- bod- kyi- skabs- la- levu- bcu- las- skabs- gnyis- pa- bod- kyi- rgyal- rabs- bzhugs》。《吐蕃史》也是全书与众不同的精华所在，受到广泛的关注。

该书作者自述于42岁和60岁先后两次撰写此书，最后完稿于61岁阳木鼠年(shing- pho- byi- bavi- hor- zla- gnyis- bvi- tshes- gcig)(明嘉靖四十三年即公元1564年)，写作地在贝桑结敏久伦珠寺(dpal- sangs- rgyas- mi- vgyur- lhun- gyis- grub- pavi- gtsug- lag- khang)，刻版于洛扎乃溪卡(lho- brag- gnas- kyi- gzhis- kha)。因为在洛扎刻板，故亦称《洛扎教法史》，而《贤者喜宴》乃藏族学者常用一藻饰性的名称，并以此名世。除正版木刻版外，目前尚有打印以及印刷等版本。国外天竺钱德拉·罗开什(Chandna Lokesh)有手抄楷书晒蓝本(其中ja函为原木版影印本)，书名《mkhas—pahi- dgav- ston of Dpah- bo- gtsug- lag also known as lho- drag- chos- vbyung》，公元1969年。

据《土观宗派源流》一书载，巴卧·祖拉陈瓦是当时一位“著名大德”，又是噶举派噶玛支系的活佛。在治学方面，该书说他“适应时代要求，专重研究五明者论”，“其学问可入善巧之数，著有八行论大疏、历数学论、佛教史等”。^[3]其一生博学多才，精通藏族历史、宗教、文学、地理、建筑、音乐、歌舞、美术、医学等学科。《贤者喜宴》以史料翔实和内容丰富而闻名遐迩。以时间而论，从远古西藏以迄元明藏族史，言其内容，除西藏本身之外，还涉及汉地、突厥、苏毗、吐谷浑、于阗、南诏、西夏、蒙古等，至于古天竺、泥婆罗、克什米尔、勃律、大食等亦多有记载。具体说来，该书述及藏族的政治、历史、经济、宗教、文化、法律、天文、地理、自然、医学、建筑、音乐、歌舞、绘画等。

作者治学严谨，探微求源，尤其重视原始史料的搜集，例如吐蕃早期十二小邦的史料就与敦煌古藏文史料基本相合。而桑耶寺几次兴佛盟誓之盟文诏书，就目前来说可谓独此一家。至于吐蕃末期属民奴隶大起义的史料，亦堪称首屈一指。这样，就形成他的以史料为主、以论为辅的史学风格。在行文方面，朴实无华，用词通俗简练，无晚近藏史中的冗长浮华之风。他虽尊重史实，用词朴实，但有时文中也出现史料堆砌、衔接有差、出处不明等缺陷，此外，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如同藏史的某些作者一样，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身为宗教上层人士，因此唯心史观、宗教意识和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在其著作中

屡见不鲜，这反映了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然而这些瑕疵并不掩其长。总观全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贤者喜宴》一书终可列入藏文书籍中之上乘，它是整个藏族史籍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作者以广泛的学识，严谨的治史态度给后人留下了一部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考订伪误、增补缺漏的史学巨著。

二、主要内容

为了方便阅读，我们在译注时将《贤者喜宴——吐蕃史》共分为19章121节，主要章节及其内容如下：

第一章共有16节，即西藏远古情况，远古统治西藏的十种情况，西藏人类的起源，古代十二小邦；聂墀赞普的出现，穆墀赞普及“天墀七”；止贡赞普及苯教的出现；止贡赞普与洛昂达孜的斗争；布代贡杰时的经济；吐蕃早期苯教，赞普“六地列”；“八代王”与“五赞”；拉托托日年赞及早期佛教文物；墀年松赞及仲年代如，达日年塞时的政治、经济；囊日松赞执政。

本章作者着重叙述了西藏人类起源、古代西藏的历史以及从吐蕃第一代赞普聂墀赞普至囊日松赞之间三十二代赞普执政期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情况。作者征引了翔实的罕见史料，对从聂墀赞普至囊日松赞历代赞普的史绩作了客观而忠实的记述。此期间，由于吐蕃历代君臣百姓的艰苦创业，尤其是历代君臣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到赞普拉托托日年赞时，社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从布代贡杰至囊日松赞长达九百多年的漫长时间里，是藏族社会大发展的时期。

第二章共有10节，即松赞干布的诞生及执政；执政初期与造字过程；迎请四邻贤者及屯米译经；学邻族建政经验、设官及民政；建行政区划、订法律、委任官吏；吐蕃五如的划分；五如之势力范围；六十一“桂东岱”；阶级划分、官制与军事组织；七官、六决议大法及六告身。

本章作者着重叙述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史绩。作者征引了翔实的史料，对松赞干布的一生作了客观而忠实的记述，通过松赞干布的各种活动，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上的兴起过程。此期间，松赞干布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他首先内惩奸臣异己，外讨叛乱属部。政局稳定之后，立即有条不紊地着手建政。松赞干布开明，不闭关锁政，致力于一切有益于吐蕃政权建立和发展的事务，无论任何民族的长处，他都兼收并蓄，竭力汲取。汉地、突厥、弥聂(木雅)、霍尔部以及天竺、泥婆罗等地区的工艺、医药、历算、法律、宗教以及文字等等都成为吐蕃的学习对象，这为吐蕃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松赞干布还采

取了两种措施巩固吐蕃政权。一是从阶级上明确划分属民中的各阶层武士、平民及奴隶,以便根据不同阶级、社会地位分而治之,各阶级职能划分之细致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松赞干布第一次采取此措施,从而能在以广大奴隶为底层的社会基础上,使吐蕃奴隶政权得以巩固。另一方面,松赞干布从精神上加强了统治,采取了在原来苯教的基础上,同时发展佛教的措施。松赞干布奉行了和睦的政策,尤其对内地中央政权,自松赞干布起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婚姻等方面,同唐朝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文成公主的入藏和大小昭寺的建造,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体现。作者以其丰富的史料、热烈的笔触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盛况。

第三章共有 17 节,即六标志六褒贬六勇饰,纯正大世俗法十六条及戒十恶法;三法及吐蕃疆界;松赞干布迎娶泥婆罗墀尊公主,泥婆罗墀尊公主建宫室,迎娶文成公主,兴建大昭寺和小昭寺,兴建昌珠寺,建边压寺及再压寺,建四压肢寺及九掩口寺;建叶尔巴崖三所依,香雄妃等建寺,吐蕃刑法,恭松恭赞与芒松芒赞,松赞干布埋藏经咒珍宝,松赞干布遗训芒松芒赞,松赞干布与文成、墀尊二公主去世。

本章主要记载松赞干布时期的法律、迎请泥婆罗墀尊公主及汉地文成公主入藏、兴建大、小昭寺及昌珠寺等寺院,松赞干布两次执政、生前遗嘱、病故及建造陵墓等等。通过这些史料,使我们看到作为吐蕃一代名王的松赞干布,由于采取与唐中央政权亲近和睦政策,并因此而导致文成公主入藏,这使唐蕃双方长期和睦相处,彼此的社会经济文化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也与松赞干布积极向汉地及其他邻族学习有密切关系,本章还反映了汉族、突厥、党项、吐火罗、胡人、霍尔人以及泥婆罗、天竺等各族对吐蕃的影响,无论从农牧业、法律、宗教、医学、天文方面,或是从建筑、手工业、艺术以及习俗方面,都可以找到这种影响。同时在这些方面也逐渐形成了吐蕃社会的民族特点。本章资料丰富,提供了许多汉文书中找不到的珍贵史料。此章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中,多采用了赞颂的写作方式,比如在“松赞干布与文成、墀尊二公主去世”一节,大篇幅地运用了赞颂的写作方式。

第四章共有 4 节,即芒松芒赞执政,都松芒杰隆囊执政,墀德祖赞执政,迎娶金城公主。

本章主要记载芒松芒赞、都松芒杰隆囊及墀德祖赞三代赞普的事迹。从这些事迹中可以看到,噶尔家族在松赞干布死后擅政的情况,他们凭借着大相实权,一反松赞干布时的亲唐政策,开始东侵南征的扩张政策,违背了汉藏两族以及其他有关民族的友好愿望,结果是噶尔东赞域松死于军中,钦陵自杀,噶尔家族被摒除于政治舞台之外。此外,都松

芒波杰也在征南诏时死去。墀德祖赞执政初期仍走着其上一代赞普东侵的老路,但是后来改为亲唐和睦政策,迎娶金城公主,汉藏友好关系又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从本章还可看到藏文史籍中的一个共同错误,即松赞干布死后唐军进入吐蕃逻娑的杜撰,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凭空臆造。这三代赞普的事迹,在藏族史籍中都记载得比较简略。但是我们通过汉藏文有关史料的补充,还是可以看到当时的概貌。这三代赞普的政绩和某些措施,为以后墀松德赞在各方面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五章共有 7 节,即墀松德赞诞生,桑希内地取经,崇佛与反佛之争,赛囊赴印求佛,桑希助赞普兴佛,剪除反佛大臣玛祥,迎请菩提萨埵。

本章主要记载墀德祖赞晚年兴佛、王子墀松德赞诞生、墀德祖赞与金城公主去世、舅臣玛祥擅政、佛苯两种贵族势力的权力之争、桑希和赛囊两大臣分赴内地及天竺求取佛经、剪除玛祥、重振佛教,以及迎请天竺高僧寂护和莲花生大师等。墀松德赞从诞生起直到排除舅臣玛祥擅政,其间通过所谓墀松德赞认舅和兴苯抑佛等事件,争权夺利的斗争极为激烈,墀松德赞的执政初期就是在这种风浪中度过的。本章所记载的佛苯之争,远非宗教派别之争,它是旧时信苯贵族与信佛贵族势力为争夺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而展开的殊死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在墀松德赞之时多次发生,从而暴露了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墀松德赞在上述纷乱的政治漩涡中及在以桂氏为代表的藏人贵族势力和汉人桑希等人的多方协助下,排除敌对势力巩固了政权,显示墀松德赞的政治才能与气魄。本章还记载了迎请天竺寂护及莲花生大师等名僧入吐蕃之事,从此天竺佛教的中观瑜伽行派的中观宗势力开始进入吐蕃宗教界,并逐步产生影响。

第六章共有 3 节,即菩提萨埵的活动,派使者赴内地,迎请莲花生。

本章主要记载墀松德赞在消除统治集团内部以玛祥为代表的反佛势力之后,即在信佛大臣的支持下积极寻求佛教,欲图以此作为吐蕃赞普巩固政权的新式精神武器。他从天竺和汉地两方面着手,本章中的菩提萨埵及莲花生就是天竺高僧,前者是以显教为主,属中观宗瑜伽行派。后者是以密宗为主。墀松德赞迎请这两人都先后遭到吐蕃苯教势力的反对,并都先后被驱逐。但最终莲花生的密宗在吐蕃占据了重要地位。墀松德赞想从宗教上再进一步排除原有的苯教势力,以擅长咒术的莲花生成了他的武器,莲花生的这一套咒术把戏对吐蕃后来宁玛派的出现有很大影响。所以他在藏传佛教书中受到推崇,以至达到神乎其神的地步,从本章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从中得到的印象是,吐蕃统治

集团内部的斗争一向是与宗教斗争相连的。另一方面,也可看到吐蕃时期藏传佛教与天竺佛教的某些交流情况,为我们探讨藏传佛教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

第七章共有3节,即兴建桑耶寺;王妃业绩;达热路恭进攻突厥。

本章主要记载桑耶寺的建立。此外还记述了在建寺过程中吐蕃与天竺、吐蕃与突厥的关系。从本章还可以看到墀松德赞三位妃子崇佛建寺及出家的情形。从佛教意义方面来说桑耶寺是吐蕃佛教史上第一座有正式僧人居住修行的寺院。就寺院建筑方面而言,该寺是严格按佛教有关教义为指导原则兴建的,建筑艺术上体现了吐蕃建筑工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该寺的建筑是吐蕃人、汉人、天竺人、泥婆罗人及于阗人共同合作的结果,这既反映了此时吐蕃与邻族的友好关系,也从建筑艺术上显示了各族间的文化交流。桑耶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象征着佛教作为一种新兴的势力开始登上了吐蕃的政治舞台。从支持建寺的王族以及大兴土木、不吝资财方面观察,佛教势力具有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后盾,并有了藉以生存发展的据点——寺院。这些都是苯教势力所没有的。

第八章共有4节,即桑耶寺开光;藏人受戒出家;建法律;桑耶兴佛碑、译经。

本章主要记载桑耶寺开光、藏人受戒出家、订佛教大法、立兴佛盟誓碑及译经等情况。桑耶寺开光约在公元779年。开光仪式的全过程实际上是佛教仪轨在吐蕃的第一次实施,而且得到赞普王族及各大臣的支持。开光所用的物资、差役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但主要宗教负担却从此落在属民肩上。本章还记载了开光十二年及属民欢庆情况,明显地带有夸张性。不过从开光中的属民表演活动看,这种描写颇有吐蕃民俗化的味道,与那些神秘的宗教仪式相比显得清新别致。从文字记载看,吐蕃藏人出家,包括显贵王族子弟在内,一开始就带有强制性。而且最突出的一点是,出家人几乎都是贵族,也就是说官宦子弟。这反映吐蕃佛教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宗教权力也自然地掌握在贵族手中。其次,吐蕃僧人的出现,使吐蕃社会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阶层,这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阶层,因为这一阶层的人背后有王权和神权的支持,它长期深刻地影响着吐蕃社会的进程。佛教大法的订立及兴佛盟誓碑的出现,都是为维护佛教而设的,这两者都具有法律性质,以便使吐蕃人服从吐蕃佛教的摆布。有必要指出一点,在吐蕃佛教发展的过程中,客观上通过宗教活动使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某些虔诚的宗教徒,如天竺人、迦湿弥罗人、勃律人、泥婆罗人、突厥人、阻卜人等等,他们远道应邀来到吐蕃传播佛教文化,这里包括有

历史、语言、地理、宗教、民俗、建筑等等情况被介绍到吐蕃,桑耶寺本身的建筑艺术价值就是很好的说明。

第九章共有4节,即叶尔巴与曲卧日的宗教情况;建造谐拉康寺;墀松德赞颁布兴佛诏书;桑耶寺碑文。

从此章的内容可以看到,在桑耶寺建成之后,像著名的叶尔巴寺、曲卧日寺及谐拉康寺等一些修道场所又相继建成,再加上吐蕃各地的各种修道处,表明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日益广泛和深入。此时吐蕃不仅是形式上的建造寺院,而且已重视实际的修行,并且还出现了吐蕃的高僧,像著名的贝吉多吉和娘丁增桑波等。从此吐蕃出现了由本民族僧人收徒传教的局面,僧众之多已远非“七试人”之时所能相比。同时伴随着修道场所的兴起,以其为中心的市镇也得以逐渐形成,后来的叶尔巴、曲卧日、谐拉康等之所以成为著名地区均与此不无关系。吐蕃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从请僧建寺伊始便特别得到吐蕃王室的强有力的支持,这无疑是吐蕃佛教能够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十章共有9节,即制订贵族习规及攻陷长安;桂·墀桑雅拉厘定法律;牧业措施及《没庐氏小法》;九大尚论;菩提萨埵遗言与“三户养僧制”;顿渐之争起因;莲花生与菩提萨埵的晚期活动;益希旺波之业绩;顿渐之争。

本章分别记载了墀松德赞制订各种佛规及法律、建立新的经济措施、九大尚论的出现、“三户养僧制”的确立以及顿渐之争等。此外,还记载了吐蕃东侵攻陷长安事件。另还记载了佛教内部的见解之争,即所谓的“顿渐之争”,这场争论持续两年之久以及“顿渐之争”的起因。通过这些史料的记载,既可以看到摩诃衍与莲花戒佛教见解的矛盾所在,也可以看到汉藏佛教交流之深远。当然,“顿渐之争”的社会背景和实质远未揭示出来。吐蕃奴隶主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于763年入侵长安,这反映了奴隶主扩张野心。这是违背汉藏两族人民愿望的。因此很快被郭子仪等将领把吐蕃军击退。

第十一章共有3节,即顿渐诤辩;供养僧人及“三户养僧”;嘎玛拉希拉之死。

本章则主要反映顿渐之争的具体辩论情况。同时介绍顿渐双方辩论后的结局。在吐蕃时期的宗教之争有两次,即顿渐之争前的佛苯之争及此次的顿渐之争。从佛苯之争已使我们看到,表面上的苯教大臣及信佛大臣似乎是信仰之争,实际上却是新旧贵族势力的权力之争。此次顿渐之争的起始及结局也透露了这种情形,虽然其矛盾程度不如佛苯之争前的斗争那样明显而激烈。这种情况使我们可以看到苯教大臣达扎路恭在佛苯斗争时坚决站在代表旧贵族势力的苯教一方,而此次顿渐之争他又作为

主要代表人物站在顿门一边,这个好斗的旧贵族实力人物与曾是坚决反苯的大臣桂氏(新贵族实力人物)这次又成了对立面,这种情况又意味着什么呢?刚刚借助于桑耶寺的建立而得势的信佛贵族,却因摩诃衍的禅宗势力的绝对优势而成了少数派,以至桑耶寺都断了香火。在这种形势下而展开的两年之久的顿渐之争,其实质能够简单地用宗教见解之争解释得了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至于顿渐之争后,嘎玛拉希拉代表的渐门派虽被赞普宣布获胜,但不久嘎玛拉希拉被刺身亡,贝若咱纳被流放到擦瓦绒,而益希旺波则绝食而死,渐门派三个主要代表人物竟遇到这样的结局,可见其背后定然隐藏着某些政治背景。可惜现有的材料还尚不能将其清楚地揭示出来。

第十二章共有12节,即墀松德赞之死与穆尼赞普继位;拔热甸与益希旺布之死;以“十善法”推行佛教;汉、霍尔、南诏之和约;墀松德赞父子时期的译经情况;《拔协》记载墀松德赞晚年之情况;“三喜法”;穆尼赞普均贫富及建四供;穆尼赞普与穆底赞普死因;墀德松赞执政;恢复桑耶寺供养;建多吉英寺及颁布兴佛诏书。

从本章记载可以看出随着墀松德赞晚年退位修佛,赞普势力的衰落,母后及王妃势力(实际是奴隶主的派别势力)却迅速上升,她们干预朝政,蔡邦氏与那囊氏争权火拼,她们先迫使赞普流放穆底赞普,继而又暗杀致死,而蔡邦氏竟下毒和亲自害死穆尼赞普。总之,她们按照她们的喜怒来决定赞普的立废,这表明她们背后有着一股奴隶主集团势力的强大支持,她们敢于在墀松德赞生前弄死赞普而不怕遭到惩罚,正是她们力量增长的标志。再一点,母后及王妃力量的另一表现,就是公开参与朝政,她们把松赞干布时代“妇女不得参政”的规定抛掷一旁。这突出地表现在她们争得了盟誓权力,我们知道,在墀松德赞时两次兴佛盟誓诏书中均无母后或王妃参加。但到了墀德松赞的兴佛盟书中,王妃署名在盟书之首位,钵阐布及大臣署名均在其下,王妃署名是王妃势力急剧上升的突出标志。从此以后,母后及王妃势力与日俱增,发展到朗达玛晚年及其死后,吐蕃政局已完全在王妃势力操纵之下了。概言之,无论王权或王妃势力的变化如何,都表明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趋激化,预示着吐蕃王朝末日的行将到来,这是奴隶主阶级所不可避免的。

第十三章共有9节,即墀德松赞死及其后裔;墀祖德赞执政及其事迹;唐蕃会盟;厘定文字;墀祖德赞崇佛;墀祖德赞时的政情;韦达纳坚其人;韦达纳坚等乱政夺权;墀祖德赞被杀。

本章主要叙述了墀祖德赞(简称为热巴巾,亦称为可黎可足,又即彝桑赞普)的事迹。墀祖德赞的

事迹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经过他的努力请盟,终于在公元821年及822年举行了唐蕃的两次会盟。其次,墀祖德赞将吐蕃的佛教推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搞所谓“以教护政”。例如,他“把政权交予僧人”,使蕃僧参政,由吐蕃宰相沙门钵阐布、贝吉云丹等僧人主持政权的内外政务,这正是所谓“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的突出反映。墀祖德赞死后,吐蕃王族内部开始了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羽翼日益丰满的新兴世俗贵族从中渔利,韦达纳坚就是其中的代表,从他们周密而阴险的夺权过程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强大的贵族势力,此后他们一直在幕前幕后左右着吐蕃政局,他们支持吐蕃王族之间的火拼,在火拼中王族势力迅速削弱,而这些新兴的贵族势力却日益壮大,其中不少人参加了后来的吐蕃属民奴隶大起义。

第十四章共有4节,即墀祖德赞死后的吐蕃政局;朗达玛执政;朗达玛灭佛;拉隆贝吉多吉刺杀朗达玛赞普。

本章主要叙述墀祖德赞死后的吐蕃政局,其间包括朗达玛赞普执政及被刺。墀祖德赞死后吐蕃一蹶不振,急转直下。朗达玛赞普与权臣韦达纳坚等人一起反对佛教势力,他们首先集中力量剪除原来支持佛教势力的首脑人物,既突然又猛烈,致使佛教势力群龙无首。继两位佛教参政的高僧钵阐布(贝吉云丹、娘定埃增)全部被除灭后,反佛势力便对寺院和僧人采取严厉措施,即拆寺庙、烧佛经、驱逐外族僧侣以及杀害或驱使奴役僧人、禁止佛事活动等。以逻娑和桑耶寺受损失最为严重,所谓“大昭寺和桑耶寺成了狐穴狼窝”的形容,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墀祖德赞死后的吐蕃政局,通过表面反佛的激烈的夺权斗争,从实际结果看,对旧有的王族或贵族集团都是不利的,他们相互争夺也相互削弱,弄得吐蕃政权一分为二,以至最后使吐蕃政权弱到“油尽灯灭”的程度,这正是吐蕃奴隶主阶级行将覆亡的预兆。吐蕃奴隶起义是吐蕃史中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宣告吐蕃政权的垮台,也为藏区社会的进步揭开了新的篇章。

第十五章共有4节,即拉隆贝吉多吉逃往康地;《后叶尔巴志》载刺杀朗达玛事;朗达玛之嫡系;朗达玛死后的吐蕃佛教。

本章主要叙述叶尔巴寺高僧拉隆贝吉多吉刺杀朗达玛赞普的经过、拉隆贝吉多吉被追赶情况以及他逃往多康地区等。此外,还叙述了朗达玛的所谓嫡系之争论。最后是记载朗达玛后裔欧松及云丹时期吐蕃佛教的情况。通过本章记载的内容看,拉隆贝吉多吉是一名文武双全的高僧,他既出身行武,又精于佛道,同时有胆有略。终于按计划刺杀了朗达玛赞普,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更使人重视的是,他还择机逃脱免于死,而且成为多康

一带的名僧,并为吐蕃后宏期培养了佛学人才。拉隆贝吉多吉一箭结束了朗达玛赞普之命,他出色地扮演了刺客的角色,也成为吐蕃史上最后一位历史名人。当然,比起钵阐布贝吉云丹的遭遇和结局,拉隆贝吉多吉是幸运的,这也说明拉隆贝吉多吉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第十六章共有6节,即伍约之战、吐蕃属民奴隶起义、挖掘藏王陵墓、起义后的赞普后裔、王子云丹后裔、王子欧松后裔。

本章主要叙述吐蕃属民奴隶起义。其次叙及朗达玛赞普王族经过起义的打击逃往吐蕃各地的情况。如果说朗达玛赞普被刺是吐蕃王族失去王权的开端,那么这还仅是其王族内部的问题。但是云丹、欧松两王子争权割据,却是一统王朝的分裂之始,这是吐蕃史上前所未有的。继而招致的“伍约之战”,它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第一,表明吐蕃王族矛盾不可调和,彻底分裂已不可逆转。第二,“伍约之战”可以说是奴隶主贵族的自掘坟墓,它为吐蕃属民即奴隶、平民、一般贵族准备了起义的条件。此外,起义军首先在多康举起旗帜,然后南归,与叶如、伍如、约如的起义军相配合,其起义规模正如“吐蕃内乱”带有全局性一样,也是遍及吐蕃全境。起义军声势规模之大,迅速猛烈;斗争之策略,坚决彻底。公元869年的起义是吐蕃属民奴隶的一次光辉的革命,它宣告吐蕃旧奴隶制的灭亡,也促使封建经济制度的早日诞生。“十种王系统”的出现,就是封建割据的早期标志。以赞普为首的吐蕃奴隶主政权从此消失,大部分赞普陵墓被掘,表明起义的主要目的达到了。往日“奴隶不得造反”,“不准掘陵”的吐蕃法律,已被奴隶阶级踩在脚下。“那些法王的大部分王族子孙,在那以后的时期里,均成了属民或属民的属民,而众多的奴隶及奴隶的奴隶则傲慢而自大。”^[4]这种阶级地位的变化正是起义的结果。起义后,旧的王族四散逃亡,在旧臣僚的扶助下寻找一隅安身之地,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渐从喘息中有所恢复,但已再无旧日的那种神气。

第十七章共有2节,即德祖衮后裔和德祖衮后裔兴佛之举措。

本章记载了吐蕃王族后裔的传承情况(主要是约松一支的情况),这一支虽分布到各处,但主要是以阿里为基地,然后发展到卫、藏、山南、藏北及东部青海的湟水流域。这说明吐蕃王朝垮了,但其王族依然存在。他们各据其地为政,虽然仍曰为“赞普”,但只是一地之长而已,与昔日“赞普”相比,唯有其名而无其实。然而总观其时诸王后裔之行为,他们对阿里地区进一步地开发和管理还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各地之发展也与诸王裔的推动不无关系。此时各地都在发展佛教,以阿里托林寺为主要道场形成一个新的地区性佛教中心,重建并振兴

了佛教。这时建佛寺、塑佛像、筑塔、写经,甚至在1076年孜德王于阿里举行了火龙年法会,汇集了卫、藏、康三地的高僧大德。如此大规模法会的召开,反映了当时吐蕃社会已趋于稳定、经济亦有相当的发展,这时从吐蕃奴隶起义算起正好经过了一个世纪。其他各地教派也在逐渐形成并开始发展。热振寺、萨迦寺等寺院的出现就在此时。当时又出现了一种宗教热,为了搜集黄金迎请外族高僧,拉喇嘛益西约不惜交出政权、付出生命为代价。不少王裔及其子孙也相继投靠止贡巴、帕竹、萨迦诸派大德,陆续出家为僧。这种情况表明,诸王裔又重蹈昔日赞普之后尘。

第十八章共有2节,即阿底峡进藏前后的吐蕃社会、奴隶起义后寺院的败落与恢复。

本章主要记载阿底峡进藏前后的吐蕃社会、经济及佛教情况。而主要记载吐蕃奴隶起义后的佛教衰败情况,同时记载作者对这些情况的评论。从本章有关佛教如此衰败腐化的情况看,使我们认识到,迎请阿底峡进藏及阿底峡传法的宗教意义,阿底峡进藏传法远非一般书上所载的那么容易,他遍游卫藏各地,看来不是轻松的游历和一般传法,他以极大的力量,匡正吐蕃佛教的时弊,直至佛教基本回归了正道,可见他是颇费心力的。也必须指出,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在揭露当时佛教的败坏情况是客观的,是揭示了历史的原貌,应对此予以称道。然而,身为佛教徒的作者又引用大量佛经教义,去为伤风败教的所谓“僧人”的邪行大力开脱,那显然是错误的,也是开脱不了的。此外,文中还记载了大小昭寺及桑耶寺的破坏和恢复、增修、装饰,说明今存的大小昭寺及桑耶寺已经在历史的动荡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原貌。

第十九章共有2节,即保护大昭寺及兴建逻娑河坝、修缮大昭、桑耶、叶尔巴等寺。

在本章中,作者分两个主要内容来写,一是从佛教意义上阐述保护好逻娑、桑耶、叶尔巴地区的寺院及其有关佛教文物的意义及必要性。因此,必须对上述诸佛教文物加以保护、预防及修缮。二是为保护和发展吐蕃佛教,本文着重首先要保护好逻娑,为此提出必须大力建造保护逻娑河堤坝。从本文记载,即可以看到关于建坝治龙的神话传说,又使我们得知逻娑河坝的建造过程,逻娑平原农牧业经济的发展与逻娑河坝的兴建密切相关。今日所存河坝已经历许多代藏族人民维修和重建,显示了吐蕃劳动人民在兴建水利工程中的勤劳与智慧。关于维修和保护逻娑、桑耶及叶尔巴地区诸寺,本章反映了不少佛教的说教和神话。至于书中一再提醒吐蕃人防备天灾人祸对逻娑、桑耶、叶尔巴诸寺的可能出现的危害,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反映了吐蕃人民爱护藏区佛教文物的美德。

本章最后作者说明他撰写《贤者喜宴》吐蕃史(ja 函)的目的和所依据的史料。在作者所提到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作者所列的书目仅是主要部分,而非全部,例如作者在前述正文中提到他曾引用过的书(例如《大盟誓》、《后叶尔巴寺志》等)就未列入结尾的书目之中。作者还有许多实地考察的调查资料在写作时曾引用,如兴佛诏书、碑文、大昭寺及桑耶寺中的实物等。总之,作者是在博览群书的情况下而写成此名著的。

三、史料价值

近年来,随着大量藏文文献被运用于藏学研究的许多领域,人们对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吐蕃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为研究吐蕃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也填补了中国历史以及藏学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一)藏族族源

藏族族源问题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在一些藏族史籍中有关藏族族源的记载有着与佛教紧密相关的动人传说。《贤者喜宴——吐蕃史》采用了藏族传统的说法即“神猴与岩魔女结合”产生了藏族的后代。《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认为吐蕃第一位赞普是“从天而降,作为天下之主”。《雍仲苯教史》重复了所谓“猴与魔女结合”的说法,但对苯教最崇拜的辛师却又认为是“六个黄色发光之卵”所生的后代。苯教史《四洲之源》则说西藏人类是天神的后代,即由天神之子茹(rug)、祥(zhang)、波(bo)及果(sgo)等七幼童繁衍而成。藏族族源的产生与分支,虽有多种说法,但《贤者喜宴——吐蕃史》的作者认为:神猴与岩魔女结合生下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六个小猴崽,他们皆分为父系和母系两种,出自夫猴之系的有信仰、勤奋、慈悲和喜欢施舍,且性情柔和、出言谨慎、善言、天性向善,但胆小而身心轻浮。出自罗刹女母系的大部分烦恼多,好争斗且嫉妒性强、贪食、性情粗暴、常说人短,但身强力壮,无所畏惧。后来逐渐繁衍成四部即所谓藏族之斯(se)、穆(rmu)、桐(ldong)及冬(stong)等四人种,后来增加查(dbra)、楚(vdru)共六人种,以后依次由十二小邦等统治的古代藏族历史。^[5]藏族猕猴变人神话也有一个类似生命演进阶段的划分,其神话的推理具有生物自然演进为人类的观念,按其逻辑推理,生命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转化过程,这一点倒与达尔文的看法有相似之处。此外,《贤者喜宴——吐蕃史》的作者尊重史实为本,直言不讳。如对藏族族源和聂赤赞普来源于印度一说,虽有一些藏文权威著作肯定后已成定论的情况下,他

旁征博引,不讳“圣人”,以极令人信服的史料,指出了“印度一说”的谬误,可以说他是古代第一个反对“印度说”的史学家。上述这些关于藏族族源的珍贵史料,为藏族族源研究的深入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吐蕃的佛教

有关吐蕃佛教的记述,《贤者喜宴——吐蕃史》运用了大量史料论述了从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至德祖衮的兴佛措施和发展历程。吐蕃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从请僧建寺伊始便特别得到吐蕃王室的强有力的支持,这无疑是吐蕃佛教能够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这可以通过《贤者喜宴——吐蕃史》所记载的两件兴佛诏书和一通兴佛石碑得到进一步说明。这三件是吐蕃时期可信的珍贵文献,无论从文字到内容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其内容告诉我们,吐蕃的一些重大事件的决定是通过以赞普为首的大臣盟誓的形式进行的,或者说它是当时的特别重要的形式。而且一经盟誓署名决定就使诏书具有不得违反的法律性质。吐蕃的佛教便通过诏书、盟文形式而开始定其为正统宗教,申明吐蕃世代尊崇佛教而不得违反。言外之意,吐蕃原有的苯教势力即被完全排除,就连一向崇苯而不怕流放的大臣恩兰·达扎路恭也署名于诏崇佛书。就诏书内容来看。如果说松赞干布时的群臣盟誓着重于效忠赞普,那么时至墀松德赞之际的盟誓诏书,其内容则以崇佛为中心了。这反映了吐蕃赞普王权此时已相当巩固,也就是说属民从此时起就要受到王权与神权的双重控制。诏书的丰富内容提供了许多可供研究的史料,例如盟誓、崇佛、佛教发展过程、王室与佛教僧侣的关系、吐蕃佛教与邻族勃律、苏毗及吐谷浑的关系、吐蕃佛教的经济来源、吐蕃官职及官员的变化等等。

《贤者喜宴——吐蕃史》记载的桑耶寺几次兴佛盟誓之盟文诏书,就目前来说可谓独此一家。文中有兴建大小昭、桑耶及叶尔巴等寺及桑耶寺兴佛盟誓(bkav- gtsigs)、“七试人”(sad- mi- bdun)、佛本和顿渐之争(ston- min- kyi- rtsod- pa)等记载,使我们看到佛教的发展及其社会的作用,通过由“三户养僧制”(rab- byung- re- la- vbangs- mi- khyim- gsum- gsum)到“七户养僧制”(vbangs- mi- khyim- bdun)的演变以及“四大供养”(mchod- pa- chen- po- bzhi)的大力兴佛,使我们看到吐蕃广大属民和奴隶的社会负担。

通过这些史料的记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势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更为突出的特权。这表现在:

- 1、墀松赞发布兴佛盟誓诏书,这是继其父两次兴佛诏书后的又一法律性诏书,再次肯定兴佛。
- 2、在正面肯定佛教的同时,对不信或反对佛教的人,进行威逼利诱,以使彼等弃苯信佛,命令苏毗大

臣改信佛教,将拒不信佛的大臣达策甫斩首,将信佛的妃子赐予大臣陆桂,并通过讲经促使陆桂皈依佛门等。³、恢复并增加对寺院的供养。除去规定的“三户养僧”之外,还必须由其他贵族予以资助。此外,赞普又借建立“四大供”之机,动员更多的属民广开财源支持寺院。同时,赞普又先后为僧侣建造了新的根据地——噶琼寺和多吉英寺。⁴、墀德松赞盟誓诏书再次肯定在经济上对寺院的支持,并且让八十七人署名盟誓,以示支持。其次从“三喜法”中可以看到对赞普权力的法律约束,即承认赞普杀属民的无罪,但又规定赞普以维护法律为条件,否则不能对属民治罪。这里所谓的属民指贵族而言,“三喜法”的“喜”,主要不是指贵族属民的“喜”,因为“三喜法”是由对穆底赞普杀属民是否治罪的问题引起的,而结果终究流放了穆底赞普。总之,“三喜法”是解决赞普与贵族之间的法律关系,因奴隶阶级是根本不可能得到什么法律保护的。“三喜法”的执行过程,表明赞普在与贵族集团的斗争中失败了,因为赞普最终保护不了自己的王子不受法律制裁。尽管《贤者喜宴——吐蕃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吐蕃政治等方面的内容,但亦明显侧重于吐蕃的佛教以及寺院修筑情况的记载,因此它是研究吐蕃佛教史的最好素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唐蕃关系

《贤者喜宴——吐蕃史》通过对吐蕃历代赞普和唐朝友好往来的记载,使我们看到唐蕃关系的密切。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引证了翔实的罕见史料,对松赞干布与唐朝的关系作了客观而忠实的记述。松赞干布奉行了和睦的政策,尤其对内地中央政权,自松赞干布起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婚姻等方面,同唐朝建立了极为密切的关系,文成公主的入藏和大小昭寺的建造,就是这方面的生动体现。而作者巴卧·祖拉陈瓦以其丰富的史料、热烈的笔触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盛况。

墀德祖赞执政期间,唐蕃友好关系得到了发展,继都松芒波杰从汉地取得茶叶和各种乐器之后,金城公主又将医药、历算、和汉地的五经传至吐蕃。继而赤岭交马、甘松岭互市,扩大了汉藏经济交流的范围。在宗教方面,一面派人前往汉地寻求佛典,另一面汉地和于阗僧人被迎至吐蕃。汉地僧人还协助吐蕃,将汉地的医学和历算等著作译成藏文传播。金城公主还将汉地的一些宗教礼仪及习俗传至吐蕃,如朝拜释迦佛像等谒佛仪式、对死去的大臣进行“七期荐亡”的追悼。此外,还记载了那囊氏与金城公主争夺王子墀松德赞的生动场面,最后以墀松德赞认汉人为舅告终,此墀松德赞认舅故事,使汉藏间“甥舅一家”的关系进一步牢固地建立起来,影响极其深远。

墀德祖赞晚年继续保持同汉地的密切关系,他

派使者向唐朝皇帝求取汉地佛经千部,并首次朝拜五台山,其间受到唐朝皇帝及汉地僧人的盛情款待。这种以宗教文化交流为特点的汉藏友好关系,在墀德祖赞及墀松德赞两代赞普间甚为突出,值得指出的是,在吐蕃任职并受到特别重视的汉人桑希、巴德武、贾珠嘎堪等,为此贡献尤为显著,从而获得吐蕃赞普的高度赞扬和宠信。而且通过这种交流使汉地佛典传入吐蕃,并推动了吐蕃佛教的发展。

顿渐之争是汉藏宗教文化交流方面的一件大事。墀松德赞时期是汉藏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不断交流的时期,而其中以汉禅师摩诃衍入藏达到高潮,由摩诃衍等汉地禅师将汉地特有的禅宗学说传到了吐蕃宗教界,并从此影响到藏传佛教中的某些宗派,而且流传后世。像桑耶寺建立后大批吐蕃人跟随莲花生等天竺僧人出家一样,不久以王妃、大臣为首的无数显贵属民,又皈依于摩诃衍的汉地禅宗门下,几乎近于完全取代原有的天竺教派,这种情况很值得深思和研究。特别应提到的是,墀松德赞又再次派使者赴内地求取佛经。使者在内地受到唐朝皇帝和汉族僧俗人等的盛大欢迎,使他们请汉地和尚传授教诫的愿望得到满足,并以大量礼物相送。从当时的记载,使我们看到汉藏之间的亲密关系。

墀祖德赞的事迹中最主要的是在公元821年及822年举行了唐蕃的两次会盟,实现了唐蕃“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的大好政局,结束了过去时战时和的时期,在他主政30年的时间里,使唐蕃间“边候晏然”。墀祖德赞对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作出了巨大贡献,逻娑今存的唐蕃会盟碑就是此时的历史见证。

(四)吐蕃的行政建制

《贤者喜宴——吐蕃史》不仅叙述了古代赞普们的兴佛业绩,更是大量地记载了吐蕃政治、军事、法律、文化、行政建制等方面丰富史料,较全面地反映了吐蕃时期历史。赞普松赞干布时期,不但能吸收外族经验,还能结合吐蕃具体情况,实施和建立有吐蕃本民族特色的各种措施和体制:军事上和行政上相结合,产生了“五大如”和“六十一东岱”的军事行政社会组织。为了管理和掌握自上中央下至部落的各级政权,择取各民族的贤良之士,无论王族或宦族出身均可入官,四尚一论,外相、内相皆可发挥所长,各地如本、东本等各级官吏,亦能各持一面,加之法律严明,令行禁止,起到了维护政体的作用,致使身兼军事行政两任的官员大权在握,忠于赞普,从政体上建立起吐蕃各级政权,并在初具规模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赞普墀松德赞在以桑耶寺落成为契机大力发展佛教之后,随即着手于法律的制定,其中突出的

是刑事方面的法律,即所谓医疗赔偿费及命价赔偿的法律,这些法律明显地维护贵族利益。在经济措施方面,首次规定吐蕃全体属民每户必需饲养大牲畜四头。并宣布富豪可以放债等。贵族势力不断增长,著名的九大尚论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其中有的以高官显赫著称,有的以占有大量奴隶为荣,也有的以攫取奇珍异宝炫耀于世。九大尚论的史料生动地揭示了奴隶主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占有情况。

此外,《贤者喜宴——吐蕃史》征引了藏文史籍《广史》(lo-rgyus-chen-mo)一类至今已难以见到的原始史料,而这些史料又多数能与汉文史料、碑铭及敦煌古藏文史料相印证,因此其学术价值甚高。例如,通过吐蕃时期各赞普的经济措施和“七智勇谋臣”(bod-yul-vphrul-blon-mdsang-pavi-mi-bdun)业绩的记载,为我们勾勒出吐蕃经济各阶段的一般特征。松赞干布划分“如”“东岱”以及各如之军队编制(ru-rta-ru-dar-ru-dpon),使我们得以洞悉此时军事行政区划基本概貌;“七官”(dpon-bdun)及“三十六制”(bod-kyi-khos-sum-bcub-rtsa-drug)的设置,如此吐蕃王朝的管理体制即可一目了然;“桂”(rgod)、“雍”(gyung)、“阐”(bran)、“悠”(gyog)、“更”(kheng)等阶级的划分,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吐蕃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等级差别,同时为确认吐蕃奴隶制社会性质提供了可靠的根据。通过《大清净民法十六条》(mi-tshos-chen-po-gtsang-ma-bcu-drug)、《九类木牍法》(byang-bu-cha-dgu)和《三喜之法》(zhal-ce-dgav-gsum)等法律记载,可以看到吐蕃贵族奴隶主怎样利用法律以巩固其统治。

上述这些记载是当时、当地人记载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它的出现和一批藏文金石录、简牍的利用,使吐蕃行政建制研究摆脱了困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提供了大量汉文史籍缺载的新史料,如吐蕃的军事、经济、政治制度、人口情况等,从而使吐蕃行政建制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而且还纠正了汉文史籍中的不少谬误,印证和补充了汉文史籍的某些记载。相比专门讲述吐蕃王朝史的《王统世系明鉴》、《贤者喜宴——吐蕃史》对吐蕃的行政建制的记述更有价值,其内容更为充实。

(五)吐蕃的奴隶起义

《贤者喜宴——吐蕃史》关于吐蕃末期属民奴隶大起义的史料,亦堪称首屈一指。例如,对于吐蕃奴隶起义,他虽在文中流露出惋惜吐蕃一统王朝的衰亡之情,但总的来说,他并未站在皇权主义立场上去对奴隶起义史料删减、篡改,亦未对起义本身大张挞伐,而是全面、如实地记录和保存了原始史料,因此使我们今日得以一览当时声势浩大的起义情景。而穆尼赞普的“三次均贫富”(bod-vpangs-lhogs-vphyag-lan-gsum-ba-du-bsnya

ms),暴露了吐蕃社会的两极分化;“九大尚论”(zhang-blon-che-dgu)拥有大量奴隶和无穷财富,而下层属民(包括rje-vbangs和lha-vbangs)等所谓“黔首之众(mgo-nag-po)”则只有破衣烂衫,这些为吐蕃王朝末期爆发“属民、奴隶起义”(vbangs-kyi-kheng-log-byas)道出了原因所在。此外,作者在治学中有独立见解,他求实而不从。例如,他对一年之内“三次均贫富”的传统说法表示怀疑,对于诸史所说吐蕃赞普陵墓在奴隶起义中均被挖掘一事,他据掌握的史料认为松赞干布等陵墓当时被保存而未遭挖掘。

从吐蕃奴隶大起义的史料看,吐蕃奴隶起义后的三大变化最为显著,一是阶级变化,原来的许多王室后裔沦为一般属民,而原来的奴隶或平民却扬眉吐气,作者如实地指出了这点,这是其他史书没有记载的,反映了作者对政治变化的重视。另一大变化,就是奴隶起义后广大下层属民生活的悲惨,如大昭寺和桑耶寺内变成了乞丐住地就是例证。第三个大变化是佛教寺院长期荒废、破败无修,而僧侣们最初是不住在寺内,如大昭寺、桑耶寺不住僧而住了乞丐,后来渐有恢复,但只是“剃发更名”而不受戒,而且不少僧人多做邪行、背离教规。作者甚至指出,其所做的非佛法的行径甚至比朗达玛灭法时还盛。这种记载弥补了其他诸书中所不载的一段空白,对于深入研究吐蕃奴隶起义颇有裨益。

(六)吐蕃的语言文字

《贤者喜宴——吐蕃史》在吐蕃的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关于藏语言文字一事,藏文史籍有各种不同的记载。据《敦煌吐蕃古藏文文选》记载:“吐蕃以前尚无文字,于此赞普时方有之。”^{[6](P574)}但苯教史说法与此大相径庭,认为在松赞干布以前吐蕃已有文字。巴卧·祖拉陈瓦沿用了敦煌吐蕃古藏文文献的说法,他认为:“屯米模仿纳卡热(na-ga-ra)及喀什弥罗(kha-che,即今之克什米尔)等文字,在玛荣宫(sku-mkhar-ma-rung)内创制字形,仿照神字连察体(lha-yig-lanytsha)作楷体字,以瓦都龙字(klu-yig-wa-rtu)作草书。天竺文字有50个辅音字母,16个元音,元音被称为i、u、e、o四个,删掉反部和叠部,加上在天竺字母中没有的ca、cha、ja、zha、za、va六个字母,同为元音和辅音字母的“A”,确定了30个辅音字母,主要有二十个基字,十个后加字,不能缺少的五个前加字,没有也可以存在的字母wa、ra、la、sa为下加字,元音o、e、i在字母上犹如戴在头上的帽子,元音u犹如座下坐垫之美丽,并分为强音、中音、弱音,七个判断词和合集音,并制定了连词、分词、增词、否定词等。屯米又著有《声明学》(mdo-rdzivi-sgra-mdo)、《藏文三十颂论及相转论》(sum-rtags),这些谓之《声明论八部》(br-

da- sprod- kyi- bstan- bcos- brgyad)。”^[7]藏文自创制以来,形成规范的文字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厘定。藏文史书记载,藏文曾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厘定。第一次厘定,是在赞普赤松德赞执政以后,为了改进藏文,命噶、焦、湘三位译师厘定藏文,统一佛学名词等。第二次厘定,是在赞普赤祖德赞执政时期,译师们主要是统一佛经译语和简化正字法,以适应语音变化、文字规范和使佛经通俗易懂的要求。当时还编写了《语合二卷》和《大、小翻译名义集》等语法修辞和字典一类的工具书。《丹珠尔》杂部的《语合二卷》里收录了这次厘定译语的法令全文和厘定译语的词目。这次藏文厘定工作得到了吐蕃赞普的支持,以法令形式强制推行,取得较大成效。现行藏文基本上与这次规范后的藏文相同,这次文字厘定也成为鉴别古今藏文的重要标志。第三次厘定,是在吐蕃王朝分裂后,赞普朗达玛之子欧松的时代在阿里地区建立了古格王朝,古格王益西奥执政时期,命大译师仁青桑布对藏文进行了最后一次厘定。藏文经过三次厘定,更加完善,表述更为准确。藏文的厘定规范与佛典术语之统一并行,二者关系密切。文字乃佛典之载体,离开文字而无有佛典之成立,而就当时吐蕃文字之运用范围而言,最广者莫如佛教经典,其中所用藏语词汇最为丰富,而且是规范的书面文字。因此,要研究吐蕃时代藏文词汇、语法的演变,则《贤者喜宴——吐蕃史》提高了第一手资料。

此外,《贤者喜宴——吐蕃史》关于墀松德赞颁布的两件兴佛诏书和桑耶寺石碑的文字本身,为我们研究吐蕃古文字改革前的藏文情况提供了早期的物证,同时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文字运用对后世的影响。总之,关于《贤者喜宴——吐蕃史》的史料,大都可以得到敦煌文献等汉、藏文资料的印证,不少还是罕见的,因此其价值甚高。

(七)吐蕃的翻译

译经是吐蕃佛教的重要内容。《贤者喜宴——吐蕃史》记载:“松赞干布时,迎请天竺、泥婆罗诸贤者,广译佛经。天竺的阿闍黎古萨热(ku- sa- ra)、婆罗门香嘎(shang- kar)、迦什弥罗之达努(ta- nu)、泥婆罗之尸罗曼殊(shvia- la- manydsu)、汉地和尚玛哈德瓦茨(ma- hva- de- wa- tshe,旧译为大寿天和尚)等等,均至吐蕃,参加了翻译经典的工作。”^[8]如果说此前的吐蕃佛教译经多借外力,那么自从墀松德赞培养吐蕃翻译人才和藏人出家之后,吐蕃译经已逐渐通过内外结合走向独立自主地译经了。墀松德赞时期译经成绩很大,有一系列译经规定,很值得研究。

到了墀松德赞时期,在新建的桑耶寺设立了大型翻译机构,来自印度、唐朝等地的一千多人在此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事业在吐蕃开展得如火如荼。

这在吐蕃历史上,也是人类翻译史上的一大壮举。庞大的翻译队伍不仅翻译了一大批佛教经典,还翻译了文学、医学以及天文历算等方面的书籍。当时翻译的经典分别存放在三所宫殿中,这就是藏文经籍中著名的《钦普目录》、《旁塘目录》和《丹噶目录》。据流传至今的《丹噶目录》记载,当时所译经典数共27类,约七百种之多,藏文版《大般若经》即是其中之一。《贤者喜宴——吐蕃史》记载:“当巴热丹翻译《十万般若颂》之时,梦中得到如下授记:‘在吐蕃大量翻译《十万般若颂》,由此所带来的福泽将使世间均奉行大乘佛教’。当巴阐堪布曼殊向赞普墀松德赞王臣百姓宣讲《十万般若颂》之时,赞普欣喜,抚首而笑,并赐予丰厚赏赐。”^[9]其间还有许多汉人到吐蕃协助译经,据《莲花生传》,当时被迎至吐蕃从事译经等翻译工作的汉人有帕桑(rgya- nag- sang)(音译名)、和尚玛哈热咱(hwa- shang- ma- hva- ra- dsa)、和尚德哇(hwa- shang- de- ba)、和尚摩诃衍(hwa- shang- mahva- yan)、汉地学者哈热纳波(rgya- nan- mkhas- pa- ha- ra- nag- po)、和尚玛哈苏扎(hwa- shang- ma- hva- su- tra)。此外还有汉地学者桑西(rgya- nag- mkhas- pa- sam- shi)^[10]。他们不仅将汉文佛经译到吐蕃,而且还同时将汉地医学、历算等著述译到吐蕃,从而密切了汉藏两族的文化交流。

此外,巴卧·祖拉陈瓦在论述吐蕃译经时,他还参阅过丹噶、钦普、旁塘的目录以及《大乘密严经》、《世间施舍论》等许多佛典。特别是作者还引用了古老的近似敦煌文献的文书档案资料,显得尤为珍贵,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综上所述,《贤者喜宴——吐蕃史》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所蕴含的众多历史文化信息,需要从多方位、多学科的角度加以研究,从而不断充实吐蕃的思想史、文学史、民族关系史及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史料。《贤者喜宴——吐蕃史》不仅记述详备,考证精当,而且史料丰富、可靠,大多可与《敦煌历史文书》相互印证,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今天,国内外藏学界视这部历史文献为研究吐蕃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

四、翻译出版概述

翻译出版《贤者喜宴——吐蕃史》是受黄颢先生的嘱托,黄先生生前住院时,笔者多次前往医院看望过他。记得在2004年5月2日去医院看他时,他语调深沉地对我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贤者喜宴——吐蕃史》全部翻译出版,现在我是无能为力了,只能请你帮我完成此任务。”说完就将一大包翻译手稿交给了我。看着躺在病床上(当时已经知道他的病到了晚期)的黄先生,我无言谢辞,

(下转25页)

时收割、何时举行重要的家庭仪式？妇女们还要操心儿女的婚事，处理丈夫那块凯帕制土地的相关事务，筹措资金支付利息和缴纳税收。她们还要承担许多本该是男子的农活——栽种、培育和收割，直到锄头都成了“妇女的工具”。

在亚洲的小规模农业社会中,当男子很少长时间离开家园时,妇女基本不关心政治、战争和外交。南亚妇女的传统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林布族女子,她们现在要承担与男性相同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同时,由印度教徒大量迁入促使了林布族人产生了民族主义情绪,对种姓制度的看法也不同于印度与尼泊尔其他地区。

〔参考文献〕

- [1] Evans–Pritchard, E. E., 1963. On the Position of Women in Society and Other Essays. [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 [2] Regmi, Makes C.,1965. Land Tenure and Taxation in Nepal: The Jagir, Rakam, and Kipat Systems [M].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No.8.
- [3]Mayer,Ralph.,1960.Caste and Kinship in Central India: A Village and Its Region.[M].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4] Caplan,L.,1967.Som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tate Land Policy in East Nepal. [J].Man 2:107-14.
- [5]Rosser Collin.1966.Social Mobility in the Newar Caste System. In Caste and Kin in Nepal,India,and Ceylo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Hindu-Buddhist Contact Zones, [C]. Von Furer-Haimendorf ed. Bombay:Asia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陈立明]

[校 对 梁成秀]

[illegible]

(上接 10 页)

只好接受了此重任。黄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认识黄先生是在 1978 年,当时我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的教师大洛多先生同住在中央民族学院的 12 号楼的 1035 房间,此时黄先生正在摘译《贤者喜宴》的有关内容,因此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来向大洛多先生请教有关翻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这样我们就相识了。虽然时隔三十多年了,但黄先生不耻下问、谦虚求教、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还给我讲了藏文资料的重要性。在他的启发下,我才入手先后与他人翻译了藏文史籍《红史》、《萨迦世系史》、《藏族古代法典》等著作。后来我与黄先生一起参与了多项课题,比如撰写《西藏五十年丛书》、编辑《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为北京电视台拍摄《走进喜马拉雅》担任历史顾问等。

《贤者喜宴——吐蕃史》是在黄先生摘译(译文早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分期发表)的基础上,我将黄先生未翻译的内容全部译出,同时对黄先生摘译的译文及注释进行了录入、校对及部分修改。此译注本按照黄先生的嘱托,根据其内容,每个章节均加有小标题;为突出其主要内容及有助于研究,在每章的开头皆写有内容提要,并对有关内容做了一些注释,为国外和国内藏学专家和学者的研究提供原始资料。书后附有藏文《吐蕃史》的影印本。

和拉丁文转写。此外,著名的藏学家王尧先生对《贤者喜宴——吐蕃史》给予很大的关注,在百忙中应笔者之请求,慷慨作序,使拙译大为增辉。

《贤者喜宴——吐蕃史》,黄颢、周润年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开本 880×1230(毫米),印张 29.75;字数 850 千字;定价 120 元(人民币);预计于 2009 年 12 月可与读者见面。

[参考文献]

- [1]丹珠昂奔著,周润年.藏族大辞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
- [2]东噶藏学大辞典[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 [3]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
- [4]《贤者喜宴》木刻版 ja 函,144 页上.
- [5]《贤者喜宴》木刻版 ja 函,4 页上.
- [6]王尧,陈践.敦煌吐蕃古藏文文选[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7]《贤者喜宴》木刻版 ja 函,14 页下.
- [8]《贤者喜宴》木刻版 ja 函,17 页上.
- [9]《贤者喜宴》木刻版 ja 函,105 页上.
- [10]《莲花生传》木刻版,146 页下-153 页上.

[责任编辑 陈立明]

[校 对 梁成秀]

Mkas-pavi-dgav-ston---the History of Tubo and its Historical Values

Zhou Ruinian & Huang Hao

(The Tibetology Research Schoo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81)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content,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values of a famous Tibetan classic Mkas-pavi-dgav-ston---the History of Tibet. Based on many original and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including the proclamations of Tibetan king Songtsan Gampo, alliance formation oaths, Tibetan tribes, clan's distribution and the list of 5 army commanders and 61 chiefs of one-thousand soldiers, this book not only depicts the achievements of Tibetan king Songtsan Gampo but also records Tibetan politics, military, law, cultur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Key Words: Mkas-pavi-dgav-ston; the History of Tubo; historical values

The Origin of Oirat Mongol Tribes in Qinghai

Written by Satotyo (Japan), translated by Meng Qiuli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Centering on Khoshut trib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es, pastoral areas and chiefs' lineage of various Mongol tribes in Qinghai, and discusses their historical transition and the process of being absorbed into Manchu Eight-Banner System after Lobzang Tenzin's rebellion.

Key Words: Qinghai; Khoshut; Eight Taijis; Pastoral Areas; Lineage

The Changing Society of Limbuan in Nepal

Written by Rex L. Jones, translated by Yunshui Zhou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275)

Abstract: The Limbu living in eastern Nepal is an ethnic group that has a relatively large population in the ethnic groups living in the Himalayas. In history, as the upper castes continued to move to places where the Limbu had lived, the Limbu were forced to mortgage their fertile land, and even to leave their places of origin out to make a living. The Limbu who had made lots of money returned home, and they not only redeemed the pledge of land but also began to pursue other trades, replaced the old headman, and became the local elites. The Limbu's view of the caste system expressed their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but the rapid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have made the Limbu's culture converge with the Indian culture. The Limbu women's power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greatly, which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activity and cultural contacts.

Key words: the Limbu; the culture of Himalayas; women; social change